

書

叢

鳴

公安三袁



鹿

鳴

叢

書

公安三袁

陳書良 主編

岳麓書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公安三袁/熊礼汇选注,一长沙:岳麓书社,2000
(鹿鸣丛书)

ISBN 7-80665-023-7

I. 公… II. 熊… III. 公安派-文学研究

IV. I20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60593 号

责任编辑 徐耕白

封面设计 蔡 晟

公安三袁

熊礼汇选注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(长沙市河西新民路 10 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交通学院印刷厂印刷

200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3.375

字数:310000 印数:1-3,000

ISBN 7-80665-023-7

I·510 定价:2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

厂址:长沙市赤岭路 45 号 邮编:410076

编辑缘起

一九九六年岁末，正是岭南梅萼溢香的时节，我参加深圳书市，得遇老友徐耕白。耕白兄是岳麓书社编辑，我们所谈，当然以书为主。这一夜，从华灯初上到云淡星稀，我们商量编一套古代诗文丛书。然而，目下古代诗文选本如过江之鲫，我们如何出新呢？

我们以为，诗文以风格区分者，古已有之，今不乏见。如梁简文帝标宫体之目，杨亿、刘筠主西昆之派，乃至宋词有豪放、婉约之分，皆为此类。以地域区分者，古已有之，今不乏见。如《隋书》明江左、河朔之辩，刘师培申南北文学不同之论，乃至江西诗派、桐城义法，皆为此类。以时代区分者，古已有之，今不乏见。如唐诗有初盛中晚之论，宋词有南北两宋之说，乃至元和新体、大历诗风，皆为此类。而以群体区分者，古亦有之，而现今选本则较为罕见。

所谓文学群体，即生活在同一时代社会环境下的有一定关系的文学同道。他们或为朋友，或为师生，或为亲属，切磋琢磨，诗文相激，史所称艳，人所乐道。如建安七子、竹林七贤、眉山三苏、苏门四学士、公安三袁、吴中四子、扬州八怪等等，既有典可据，亦光耀夺目，宛若文学星河中一颗颗璀璨的明星。然而奇怪的是，这方面的诗文选本却较为少见。基于此种考虑，我们决定编辑一套文学群体的诗文选集，本《诗经》『呦呦鹿鸣』，『求其友声』之义，取名为《鹿鸣丛书》。

历时年半，现在丛书已推出第一辑。坦白地说，我对这套书确有一点敝帚自珍。这倒不全是在其中东倒西歪屋，零落琴剑书，竹影横斜半帘风那般古意沁人；也不全是其中月夜榭廊，冰肌无汗，杏花影暗玉人箫那般旖旎煽情。我觉得，贯穿其中的『群体』是一根看不见的线，线之末梢系一片云水，如轻烟，如惊鸿踪影，浸淫其中久之，对于理解中国文学史当是别有会心的。

在选材方面，我们诗词文赋均收，思想性、艺术性兼顾。为适应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，附作者小传和简注。记得六年前钟叔河先生指导我注释唐诗，排印时就只将诗句分隔而不作标点。照钟丈的话说：『标点都是后人所加，去除了让读者自己去领会古人之意吧。』我们这套书一本钟氏之旨，诗词均只分句而不标点，这也可算是一点出新，请读者诸君鉴察。

这套书的编注者都是古典文学工作者，由于水平有限，缺点在所难免。然而，我们的工作是真的。尽管『认真』这两个字被某些人厌弃。或者嫌它过于沉重，或者责怪它束缚了自我。宋人诗云：『古人冷淡令人笑，湖水年年到旧痕。』我想，古人当是不会取笑『认真』的。

以上谨略叙《鹿鸣丛书》编辑缘起、义界、体例及从事者的态度，尚祈十方大德，不吝教之。

陈书良
一九九八年夏月于长沙

挥锤击破珊瑚网

自成流派三兄弟（代序）

『公安三袁』指的是晚明时期出生在公安县（今属湖北省）的袁氏三兄弟，即宗道、宏道和中道。他们是明代文学革新流派公安派的核心人物，其文学思想、文学作品，曾长期影响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，至今还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喜爱。明代的公安，只是荆江流域的蕞尔小邑，为什么袁氏兄弟能在明代文学复古与反复古的斗争中，扮演那样重要的角色，以至标新立异，开宗立派，独领风骚，应者云集，这得从地方传统文化对他们的培育和时代精神对他们的激励说起。

三袁先祖本是驻扎公安的军屯戍卒，直到曾祖父还继承军屯传统，『出入必带剑，驰怒马，养鞞鞬衣』，而被县令署为追捕盗贼的『贼曹』。祖父袁大化就不同了，不但放弃了军籍中的世职，而且重视文化教育，萌生了使子弟通过科举向仕途发展的强烈愿望。直接起因便是他结交了由穷秀才而成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的龚大器。作为外公、舅父，大器父子对三袁的成长十分关心。尤其是仲敏，他『束发时则操觚谈文章，咄咄惊人』（宗道《嘉祥县志序》），曾随父宦游四方，受到过当时学界、文界的影响。是他将儒释之类的『异书秘文』带回公安，组织『阳春社』，把三袁接纳进去，使他们知道『程墨之外，大有书帙；科名之外，大有学问』。公安自洪武、成化以来，以科举成名者大有人在，但在学子中提倡诗文创作和求学于理学之外者，龚仲敏是第一人。

他的启蒙、引导之功，使三袁终生难忘。宗道就说他们兄弟三人能挺然崛起于公安，『点化熔铸，皆舅氏惟学先生之力也』（《送夹山母舅之任太原序》，仲敏字惟学）。

从深层次看，三袁的出现，实乃公安地方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。作为荆楚传统文化的一部分，公安传统文化自然具有荆楚文化浪漫、奇丽、飞扬、流动的特性。由于地理形势和民生环境的特别，其传统人文精神亦自有异。这几个历史人物的事迹就可看出。

东晋那位以寒素、博学知名于世的车胤，就出生在公安西辛里。他自幼笃学不倦，家贫不常得油，夏夜就用白绢做个口袋，装进几十只萤火虫，用来读书，后来官至尚书吏部郎。由于学识渊博，又擅长清谈，众人都喜欢与他交往，以至名士聚会，若他不在座，众人即云：『无车公不乐！』

又如生于梁代，受到陈宣帝、陈后主、隋炀帝礼遇的智顓和尚，就是公安茅穗里人。他二十来岁就代替慧思禅师讲经，被禅师称赞为『说法第一』。三十来岁在金陵瓦官寺讲经，又以新颖的见解和极好的辩才博得众多官僚和僧徒的信仰。后来，陈后主召他在金陵太极殿讲经，要几位高僧用难题问他，他却对答如流。智顓研习佛理，特点是敢于独出己见，锐意创新。其学既用师说，又不拘于师说，而是对众多学派的说法，加以抉择去取，构成新的思想体系。因而他能成为中国佛教第一个宗派——天台宗的实际创立者。

再如北宋的张景。大家都知道他能言善对，思维活络。宋仁宗问他公安有何胜景，他立即答道：『两岸绿杨遮虎渡，一湾芳草护龙洲。』又问他『所食何物』，即对曰：『新粟米炊鱼子饭，嫩冬瓜煮鳖裙羹。』其实，张景还是北宋前期的古文改革家。他是柳开的及门弟子，继承了老师

力矫五代文弊的革新精神，在昆体流行之时，不怕势孤力单，和穆修等人提倡古文，成为最早反对昆体文风的文士之一。

从丰胤、智顓到张景，可以看出历史上公安文化人所具有的一种人文精神，那就是勤奋、坚毅、容纳、趋前、创新。简言之，就是竭其所能，推陈出新。而这显然来源于公安自古以来『水文化精神』。

公安本为古代长江南入洞庭湖的故道。秦汉以来，就是大江环抱，境内河渚纵横，湖堰棋布。故明人概言公安景象，直谓『江湖数片白，黄山一点青』（雷思霈《公安县志序》）。年复一年的水患给公安先民带来的灾难，真是罄竹难书。同时，先居与水患的长期斗争中，也磨炼了意志，增长了才干。从公安人仿佛生来就有的坚忍不拔、聪慧机敏、乐观旷达、勇于开拓的民风看来，似乎水的诸多特性，都渗透到了先民的禀性中，构成独特的文化精神。比如从其克己利人的谦让之心，就可想到『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』；从其以柔克刚的人生艺术，就可想到水性至柔而利贯金石；从其作事锲而不舍、自强不息的韧劲，就可想到水的『不舍昼夜，盈科而后进，放之四海』；从其永不满足于现状、求新求变的精神，就可想到水的恶静好动不得其平则流。就连思维的活络、说话的快利，也使人想到水的流转自动，滔滔汨汨。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显然，公安这一片水土对三袁的滋养，除了供作食物稻菽鱼虾之外，重要的还有以『水性』为特征的地方传统文化。

三袁出生在虎渡河东、西河之间的淤泥湖畔，后又迁居县城石浦河滨，宏道、中道还曾长期住在柳浪湖中，他们对公安江河湖堰的『水性』十分熟悉，受公安传统『水文化』精神浸润极深。

三袁爱水，「乐水」，三月不见水便悻悻然，因而各人都有不少写到水的精彩文字。宏道即谓「余水国人也，少焉习于水，犹水之也」。并说己乃「既水之实者」。言水之性，则谓「天下之物，莫文于水，突然而趋，忽然而折，天回云昏，顷刻不知其几千里。……故天下之至奇、至变者，水也」。由水性而作文论，则谓「今夫山高低秀冶，非不文也，而高者不能为卑，顽者不能为媚，是为死物。水则不然。故文心与水机，一种而异形者也」。由水而论及创作，则谓「既官京师，闭门构思，胸中浩浩若有所触。前日所见澎湃之势、渊洄沦涟之象，忽然现前」。由水性而论诗文艺术风貌，则谓「取迁、固、甫、白、愈、修、洵、轼诸公之编而读之，而水之变怪无不毕陈于前者。或束而为峡，或回而为渊……故余所见之文，皆水也」（《文漪堂记》）。又由水性论及为人，谓「天下之至活者，水也。……天下之用，无过于水者，而水未尝有声色臭味，以自售其用也。大人亦然」（《策·第五问》）。事实上，公安传统「水文化」精神对三袁为人、为学、为文诸方面的影响，比宏道说的还要丰富得多、生动得多。公安派可以说是植根于公安传统文化土壤中的一树奇苑。

当然，三袁文学革新思想的形成，最直接、最重要的原因，是对隆、万时期新人文精神的受容。具体说，就是受李贽等人哲学思想、文学观念的影响。钱谦益即谓：「万历之季，海内皆诋誉王李，以乐天、子瞻为宗，其说倡以公安袁氏。而袁氏中郎、小修，皆李卓吾之徒，其指实自卓吾发之」（《陶仲璞通园集序》）。李贽的「异端思想」源于阳明心学（泰州学派）和佛教禅宗，最突出的特征是对个人存在价值的肯定和对「假人」「假事」的蔑视。他敢于菲薄圣贤、非议六经，能摆脱形形色色妨碍个性自由的束缚，大胆自陈己见。他的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「绝假纯真、真初一念之本心」的「童心说」和「以自然之为美」的审美观念，就具有很强的反理学、反假道学

的批判精神。他把穿衣吃饭当做『人伦物理』，强调人『好货』『好色』一类物质欲望、自然欲望的合理性，大讲『百姓日用之道』，反映的正是当时兴起的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。

三袁中最早接触李贽思想的是宗道。他在翰林院通过焦竑、僧深有了了解李贽的观点，并用来自启宏道。后来，三袁先后在公安柞林潭和麻城龙潭两次向李贽求教，中间，宏道曾一人在龙潭住了三个多月，向李贽请教禅宗不立文字、明心见性的『教外之旨』。中道也曾只身在武昌与李贽晤谈许久。三袁受李贽教诲，如同披云见日，顿使学问跃入一全新境地，『始知一向掇拾陈言，株守俗见，死于古人语下，一段精光不得披露。至是，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，巨鱼之纵大壑。能为心师，不师于心；能转古人，不为古转。发为语言，一一从胸襟流出，盖天盖地。如象截急流，雷开蟄户，浸浸乎其未有涯也』（中道《中郎先生行状》）。

三袁频频向李贽问学，表现出主动受容新人文精神的巨大热情。由于新人文精神的激活，他们吸收的地方传统文化营养，才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功效。这样才有了乐意吸纳一切先进思想（包括前辈和时人的哲学、文学观念）的博大胸怀，才有了敢于张扬个性、独抒性灵、以狂狷自许的胆识，才有了『独往独来』、『率性而行』的人生态度和以适意为美、以入俗随世为美、以绝假纯真为美的人生意趣。也才有了『手提无孔锤、击破珊瑚网』那样一种破执缚、求自由的豪迈气概，才有了横扫文坛模拟剿袭之风那样一种狂飚突进的力量，才有了心口如一、爽朗劲健、飞扬洒脱的文风。

三袁长相相似而性格有异。所谓『一母生三人，顶踵皆相类』。『兄性温而真，弟性坦而毅。余性兼宽猛，弦韦时相济』（宏道《出燕别大哥、三哥》）。大抵宗道为人稳实，尝言『居人间当敛

其锋锷，与世抑扬，万石周慎，为安亲保身之道」。宏道踔厉风发、英特不凡，尝谓「凤凰不与凡鸟争巢，麒麟不共凡马伏枥，大丈夫当独往独来，自舒其逸耳，岂可逐世啼笑，听人穿鼻络首」（中道《中郎行状》）。中道则多狂侠之气，「即长，胆量愈廓，识见愈朗，的然以豪杰自命，而欲与一世之豪杰为友」（宏道《叙小修诗》）。由于受到相同文化精神的熏陶，三人文学观念自然相同，都在反对拟古文风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宗道主要是在馆阁与黄辉、陶望龄等「在王、李词章盛行之日」，「标新竖义，一扫烦芜之习」（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丁集）。他对拟古文风的批判精神，用「时有古今，言语亦有古今」指斥拟古之谬的方法，以及「有一种意识则创出一般言语」的观念，对白、苏诗文风格的提倡，对宏道、中道是有启发作用的。故钱谦益说：「公安一派，实自伯修发之」（同上）。中道除以创作显示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外，还对阐发宏道理论作了许多工作。特别是在宏道逝世后，他对宏道一些说法的修补和对公安派末流创作率易俚俗倾向的纠正，对公安派理论的完善和维护更是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。

公安派的旗手是袁宏道。较之兄弟，宏道尤具胆识、才智和人格魅力。他爱奇尚异，敢说敢为，极富创造性。不仅自己有破旧立新的系统理论，还能联络和吸引江盈科、陶望龄、雷思霈、曾可前、丘坦以及汤显祖、董其昌等人共倡性灵之说。其文学主张，实可代表公安派的基本观点。

袁宏道的文学主张，是在扫荡拟古文风和创建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文风的过程中形成的。其本质特征是高扬主体精神，穷新极变。其言甚多，大致可以概括为三大论。

一是文因时变的文学进化论。这是针对复古派后不如前的文学史观提出来的。复古派煽

扬拟古文风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倒退的文学史观决定的。李梦阳『倡言文必秦汉，诗必盛唐』（《明史·文苑传》），就认为『汉后无文，唐后无诗』（《列朝诗集小传·李梦阳副使》引）。李攀龙、王世贞鼓吹复古论，亦『谓文自西京、诗至天宝而下，俱无足观』（《明史·李攀龙传》）。或谓『东京之文弱』、『六朝之文浮』、『唐之文庸』、『宋之文陋』、『元无文』（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）。宏道看法不同，认为『诗之奇之妙之工之无所不极，一代盛一代，故古有不尽之情。今无不写之景。然则古何必高、今何必卑哉』（《丘长孺》）。他坚持文学进化论，除实事求是地肯定复古派所否定的唐宋散文、宋元诗歌外，重要的是强调文因时变的规律，揭示文学发展不得不变的内外动因。

受『水文化』的影响，宏道有一流动不息、有往无复的时间观。所谓『顷刻不停之谓时』，时『如驶水流，前水非后水』（《德山麈谈》），并将其引入文学进化论。认为时代变化，不可重复，决定文学的发展变化。所谓『文之趋不可止也，时为之也』（《时文序》），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，时使之也。『妍媸之质，不逐目而逐时也』（《雪涛阁集序》）。又说后代文学不同于前代文学，『殆是气运使然』（《丘长孺》）。提出『古之不能为今者也，势也』（《与江进之》）。他讲的『势』，实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，是由『世道』、『人事』、『物态』、『乡语方言』变易形成的一种发展趋向。而他强调文随势变，又落脚在对拟古风气的否定和提倡『今日之文』上。故云：『世道既变，文亦因之，今之不必摹古者也，亦势也。』『古不可优，后不可劣。若使今日执笔，机轴尤为不同。……事今日之事，则亦文今日之文而已矣』（同上）。并说拟古论者乃非『识时之士』，『古有古之时，今有今之时，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，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』（《雪涛阁集序》）。

宏道对拟古文风深恶痛绝，说剿袭者不过是『粪里嚼渣，顺口接屁，倚势欺良』（《与张幼

于》)。但在批评拟古之弊时，并不否定古代诗文的长处。如说：

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。文则必欲准于秦汉，诗则必欲准于盛唐，剿袭摹拟，影响步趋，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，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。曾不知文准秦汉矣，秦汉人曷尝字字学六经欤？诗准盛唐矣，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？秦汉而学六经，岂复有秦汉之文？盛唐而学汉魏，岂复有盛唐之诗？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，各极其变，各穷其趣，所以可贵。原不可以优劣论也。（《叙小修诗》）

这实际上是说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，各有千秋，不可抑此扬彼。所以他不但一再称赞欧苏诗文卓绝，言『彼谓宋不如唐者，观场之见耳』（《与李龙湖》），对复古派崇拜的司马迁、杜甫也评价很高。难得的是，他还看出了历代文学『各极其变，各穷其趣』，是后来者矫正前代文学之弊、加以改革的结果。而各代文学极变穷趣，往往又会产生新的弊端，于是又要来一次去弊创新。文学发展就是处在这样一个不断革故鼎新的运动过程中。如果说复古派是用倒退的、静止的文学史观为其拟古文风张目，袁宏道这种进化的、发展的文学史观，则为其务矫拟古之风、锐意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。

二是『独抒性灵，不拘格套』的创作论。这一理论的哲学基础是王阳明的良知说，而直接源于李贽的童心说。它的提出，反映了当时新兴社会力量挣脱束缚、自我表现的强烈要求。就文学斗争而言，它是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着眼，针对复古派蹈袭之风提出的创作纲领。

『独抒性灵』实际上涉及文源论。从宏道说中道『非从自己胸臆流出，不肯下笔』（《叙小修诗》），和中道说宏道诗文『俱从灵源中溢出』（《中郎行状》），可以看出宏道的性灵说是以人之性

灵为文之本源的。其说出自王阳明的心本体论，强调的是作家作为创作主体的主导作用和能动作用。同时，宏道还认为『独抒性灵』是求诗『真』之美、诗『新』之美的最好途径。所谓『心能摄境，以腕运心，则性灵无不毕达，是之谓真诗』。『唐人千岁而新，今人脱手而旧，岂非流自性灵与出自模拟者所从来异乎』。『流自性灵者，不期新而新；出自模拟者，力求脱旧而转得旧』（江盈科《敝篋集序》）。

当然，『独抒性灵』更多的是讲文学要表达作家内心的真切感受（包括理性认识和喜怒哀乐之类的情感）。首先是要表现作者的胆识、卓见。要言人之所欲言，言人之所不能言，言人之所不敢言。所谓『古人诗文各出己见，决不肯从人脚跟转』（又与冯琢庵师）。他还举例说：

昔老子欲死圣人，庄生讥毁孔子，然至今其书不废；荀卿言性恶，亦得与庄子同传，何者？见从己出，不曾依傍半个古人，所以他顶天立地。（《与张幼于》）。

苏公诗无一字不佳者。青莲能虚，工部能实。……苏公之诗出世入世，粗言细语，总归玄奥，恍惚变怪，无非情实，盖其才力既高，而学问识见，又迥出二公之上，故宜卓绝千古（《答梅客生开府》）。

宏道把『识见』称为文章之『骨』，而以『楚人之文有骨』自负。故其赞扬他人诗文之妙，总以『识见极高』、『文有卓识』为美。而说李梦阳、王世贞甘心作古人奴仆，不在于无才，而是由于无识。其次是表现人生『真趣』。宏道说『诗以趣为主』（《西京稿序》）。他所谓『趣』，即摆脱礼教羁绊、率性而为的人生意趣。『趣得之自然者深，得之学问者浅』。『有身如桎，有心如棘，毛孔、

骨节为闻见、知识所缚，入理愈深，然其去趣愈远矣」（《叙陈正甫会心集》）。他把人为童子时『不知趣而无往无非趣』之『趣』定为人生真趣的最高境界，而把高人雅士附庸风雅的行为说成是仅得『趣之皮毛，何关神情』。却谓山林之人『虽不求趣而趣近之』，谓『愚不肖』或为酒肉，或为声伎，率心而行，无所忌憚，自以为绝望于世，故举世非笑之不顾也。此又一趣也」（同上）。可见其『趣』带有很重的山林气、市民气和世俗气。说到底，就是已经俗化的文士们人生『真乐』的『快活』之趣。诗贵有趣，亦即要求充分表现他们恋世、适世、玩世的人生态度和充分享受人生的方式，以及身理欲望、精神需求得到极大满足的乐趣和适意之感。

『不拘格套』主要指的是艺术形式的变化和语言的创新。至于如何变化、创新，则取决于『独抒性灵』的需要。因为滥用格套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者无识、无趣。所谓『庸谈陈诂，千篇一律』（《与陈正甫提学》）。而独抒性灵就会带来文章结构形式的新奇和语言表现艺术的新颖。所谓『文章新奇，无定格式，只要发人所不能发，句法、字法、调法，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，此真新奇也』（《答李元善》）。宏道力主文章『穷新极变』，认为不但作者创作求新求变，读者的审美眼光也在变，『非独文家心变，乃鉴文之目则未始不变也』（《时文序》）。既然以新变为美，自然就要破格套去执缚，不可『为格套所缚，如杀翻之鸟，欲飞不得』（《叙梅子马王程稿》）。复古派把古人之法说成『非自作之，实天生之』，『实物之自则』，要通过『法式古人』以求诗文『当然之则』（李梦阳《答周子书》），实是将古人之『法』视为理学家所讲的『天理』。『天理』不可违，自然作文只能像『模临古帖』一样『尺尺而寸寸之』，不敢『自筑一堂奥，突开一户牖』（李梦阳《驳何氏论文书》）。宏道要求『不拘格套』，实是对复古派思想观念、思维方式和表现方法的否定。故一再

模拟无法写出好的诗文，所谓『瞑里少冶容，邯郸无高步』（《喜逢梅季豹》）。『优于汉谓之文，不文矣；奴于唐谓之诗，不诗矣』（《与友人论时文》）。甚至提出：『唐人妙处，正在无法耳。如六朝、汉、魏者，唐人既以为不必法，沈、宋、李、杜者，唐之人虽慕之，亦决不肯法，此李唐所以度越千古也。』（《答张东阿》）

语言创新也是『不拘格套』的重要内容。复古派法式古人，『至以剿袭为复古，句比字拟，务为牵合，弃目前之景，摭腐滥之辞，有才者拙于法，而不敢自伸其才；无之者，拾一二浮泛之语，帮凑成诗』（《雪涛阁集序》）。于是形成许多套语。既有仿古的套语，又有模仿套语的『新奇套子』。它们如同『一个八寸三分帽子，人人戴得』（《张幼于》），其实，人人都不适宜。鉴于复古派套语之弊，宏道特提出以『本色独造语』为美。所谓『本色独造语』，实为作者性灵中语。宏道主张作文『信腕信口』（《袁无涯》），出语『宁今宁俗』（《冯琢庵师》）。『已流丽痛快，安用聱牙之语、艰深之词』（《江进之》）。要求『刊华而求质』，说『言之愈质，则其传愈远。夫质犹面也，以为不华而饰之朱粉，妍者必减，媿者必增也』（《行素园存稿引》）。又称赞人能『以审单、家书之笔，发以真切不浮之意』（《江进之》）。自言『不佞下里稚语耳』（《又答徐见可太府》）。『不肖诗文质素，如田父老语农桑，土音而已』（《答钱云门邑侯》）。可见他所提倡的『本色独造语』，是一种朴素、平淡、浅俗、明畅、新鲜、活泼、极富个性色彩和表现力的语言。所谓『独造』、『信腕信口』，并非有言必录，还要合乎语法规律和文体要求，即『信腕信口，皆成律度』（《雪涛阁集序》）。

三是求『真』尚『异』的风格论。这也是针对复古派的拟古文风提出来的。突出的是对作者创作个性的尊重。复古派及其追随者只知从古人脚跟转，追影逐响，上者仅得形似之作，至多

与拟古对象同风。更有甚者，或『剽窃成风，万口一响』，或『共为一诗』，甘为『诗家奴仆』（《叙姜陆二公同适稿》），或『强为大声壮语，千篇一律』（《答张东阿》），识假、情伪如一，文风当然求同忌异。鉴于『世人之诗与人二』，袁宏道提出了诗为『其人之注脚』、『观其诗』而能知其人、『观其人』而能知其诗的『风格即人』论（见《刘元定诗序》）。他不但为人尚狂狷而耻为乡愿，论诗论文也讲个性、重『孤行』，尚异恶同，尝谓『天下事何必同而后快哉』（《张幼于》），又谓『天下之物，孤行则必不可无，必不可无，虽欲废焉而不能；雷同则可以有不有，可以不有，则虽欲存焉而不能，故吾谓今之诗文（指复古派）剽袭模拟、影响步趋之作（不传矣）』（《叙小修诗》）。他主张文学风格的多样化，并且指出，只有抒写性灵之真，才会有风格之异。所谓『大抵物贵则真，真则我面不能同君面』（《与丘长孺》）。他在肯定曾可前的诗风、文风时，说：『退如诗清新微婉，……而余诗多刻露之病。』其为人高古秀逸，力追作者，……余文信腕直寄而已』。『余与退如所同者真而已。其为诗异甘苦，其直写性情则一；其为文异雅朴，其不为浮词滥语则一，此余与退如之气类也。』（《叙曾太史集》）由此不难看出宏道求真尚异风格论的特点，即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，实是以具有抒写真性灵的艺术精神为必备条件的。

宏道的文学革新理论，以『独抒性灵，不拘格套』为核心。其论有破有立，而且破的有力，立的合理。所以『中郎之论出，王、李之云雾一扫，天下文人才士始知疏浚心灵、搜剔慧性，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』（《列朝诗集小传》丁集）。

三袁开创公安派，对古代文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，既表现在文学革新理论的建设上，也表现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。曾可前《三袁先生集序》说：『读其文，均之矫乎如云鸿之出风尘，泛